

“小茅台”

——1970 年代中国地方名酒的品牌制造与外贸策略

郭子健

摘要：白酒既是国家专卖的工业品，也是毛泽东时代走向品牌化、名品化的消费品。1949 年后，中共有计划地推行节粮酿酒方针，集约优质原料保障少数高档名酒生产，轻工业部门组织多次全国性评酒会，以塑造白酒的品牌和等级体系，上述基础工作的开展刺激了地方白酒的品牌化。1970 年代初，县级国营酒厂纷纷试制新款名酒，并转变冠名规则，以新品牌进入评酒体系和出口市场，一大批被称为“小茅台”的地方名酒品牌诞生。此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以名酒试点为代表的跨区域技术流通，使原本属于地方的酿酒工艺走向全国，为各地试制新酒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则是 1970 年财政、外贸权力的下放，县级酒厂获得大量基建投资，同时地方出口创汇需求增加。中国地方名酒的品牌化，揭示了毛泽东时代晚期中共特殊的市场经验。

序 言

“杜康造酒刘伶醉”——这是中国传统掌故中关于酒的一段知名传说。故事的主角是东晋“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和中国酿酒始祖杜康。刘伶以饮酒闻名天下。有一天，他路过杜康的酒作坊，看到一副对联，上书“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盅海底眠”，横批：“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看了狂笑而不以为然，自认是海量酒仙，扬言要把杜康的酒全都喝掉。进店之后，刘伶接过杜康的酒，豪饮三杯。不一会儿，他就觉得天旋地转，

跌跌撞撞地走回家,醉倒不省人事,一睡就是三年。三年后,杜康来到刘伶家要酒钱。家人说,刘伶已死去三年,已经把他埋了,还要什么酒钱?杜康笑道,刘伶未死,是醉过去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看看去。”他们来到刘伶的葬地,挖开坟墓,打开棺材一看,刘伶面色红润,像生前一样。杜康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嘴里还喃喃地夸道:“好酒,好酒!”从此,“杜康造酒刘伶醉”的故事便在当地传开。

这段故事,被今天的河北刘伶醉酒厂(前身是徐水县国营酒厂)作为官方讲解词,成为其产品的文化渊源,满足着参访游客的好奇心¹。1972年和1973年,以“杜康”和“刘伶醉”命名的白酒,分别在河南伊川县和河北徐水县国营酒厂试制成功,成为该省的出口创汇产品,远销海外。只不过,研究已表明,当年杜康造的酒和刘伶喝的酒都是某种形式的米酒,而非今天的白酒²。1970年代的杜康酒和刘伶醉采用的实际上都是新配方。那么,这些配方是怎么来的?这些酒又被谁消费,销往何处?国营酒厂为什么要在此时试制新酒并冠以新品牌呢?

刘伶醉酒厂恰好位于笔者所在的家乡河北省保定市。经过为期两周的参观访谈,酒厂技术人员和管理者无不自豪地在强调一则事实:“刘伶醉是当时河北省唯一的出口酒³。”那么,作为一款出口产品,刘伶醉的制造与中共对外贸易的体制有何联系?许多学者对于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印象尚停留在斯大林主义的范畴,比如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粗放的经营模式等等。而社会主义政权的贸易体制,确有其异质性因素,如 Thomas Wolf 就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外贸部门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强的市场导向⁴。对中共而言,学界已注意到外贸在整体计划经济中的角色,即“内销服从外销”是其基本方针⁵;有学者亦从中共毛泽

1 根据作者在刘伶醉酒厂的访问。

2 朱梅《白酒酿造》,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8年。

3 根据作者在刘伶醉酒厂的访问。

东时代的市场保卫战角度考察外贸体制⁶。但外贸如何影响生产？对社会主义政权而言又可以提供何种市场经验？却很少有学者进行链条式梳理。本文以地方名酒的生产为例，试图回应上述关键问题。

一、1949年后中国地方名酒的形塑

中国的白酒酿造，大致兴起于宋元时期⁷。彼时，白酒被称作高粱酒、火酒、烧酒等。直至民国时期，除汾酒等少数知名度较高的白酒作坊外，白酒普遍不具有品牌、档次区隔⁸。公认最早有影响力的白酒评定平台，是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代表团贡献了各种土产，榜上有名的白酒则是直隶省官厅、河南省官厅和山西省官厅选送的“高粱酒”和“高粱汾酒”，皆获得最高奖项(Grand Prize)⁹。但由于上榜的白酒皆以地域命名，所谓巴拿马大奖也并非附着在既有品牌上，以至于后来还有各品牌白酒对奖章争夺不休¹⁰。

由于传统白酒的主料是高粱，酒曲则多为大麦、豆类等粮食作物，自帝制时代即确立的酒类专营方针被中共延续下来，并将白酒的产销与粮食供应高度捆绑。中共在根据地时期就确立了白酒“专制专卖”方针，并

4 Thomas Wolf,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Foreign Trade in Planned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1990.

5 李光和《试论新中国外贸史上的内销服从外销方针》，《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6 黄庆林《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市场保卫战(1949-1978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五期。

7 魏岩寿、何正礼《高粱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洪光住《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

8 方心芳《汾酒酿造情形报告》，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33年；佐田弘治郎编《满洲に于ける高粱酒酿造业》，1930年。

9 刘景元《“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实况重述》，《世界食品经济文化通览第1卷》，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929页。

10 如直隶官厅酒，衡水老白干和徐水刘伶醉同时宣称其在巴拿马展出并获奖，是“直隶官厅高粱酒”的代表。详见：蔡同利《爱国志士王琴堂和他的直隶高粱酒》，《档案天地》2013年第11期，第40-42页；《1915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最高奖得主是衡水老白干》，http://www.sohu.com/a/254344499_722860。

一直厉行至大城市。1948年8月,山东解放区就颁布了《山东省烧酒专酿暨取缔私酒暂行条例》,禁止一切机关团体和个人私酿¹¹;1949年4月,华北局召开酒业经营管理会议,宣布成立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并规定“严禁私烧白酒黄酒,白酒全部国营”¹²;对重要的酒类作坊,一般都采取直接国营的方式¹³。国营的目的,是“限制粮食的消耗,增加政府财政收入”¹⁴。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老百姓烧酒常常用好粮食,因此把好粮食浪费了”,因此应当节制白酒的发展¹⁵。这基本成为毛泽东时代白酒产销政策的出发点。

1949年后,中共决定系统性地改造白酒生产,为节粮服务。改造的思路基本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制酒原料以非粮食作物代替粮食作物,因为酿酒的核心原料是淀粉,而含淀粉的除口粮本身之外,还有各种薯类、糠类、草科植物,主要是以薯干、橡子为主;二是酒曲以麸皮、稻壳等下脚料代替大麦¹⁶。

方心芳(1907-1992)早在民国时期就是活跃在学界的化工专家,1935年他曾赴比利时鲁汶大学进修酿造学,回国后参与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地点就在北京芳嘉园一号,开始着手改造传统高粱酒¹⁷。在黄海化工研究社期间,他首先提出采用麸皮制酒曲,以提高出酒率并

11 中共山东省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01页。

12 《华北酒业会议决定:酒类实行专烧专卖,严格管制私人酿造销售》,《人民日报》(第1版),1949年5月31日。

13 山西的杏花村汾酒,1949年6月1日即宣告国营,见刘集贤、文景明《杏花村里酒如泉:山西汾酒史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6-77页。

14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接管史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850页。

15 《烧酒专营可少浪费粮食,答高邑郭藕池赵玉山同志》,《人民日报》(第4版),1949年1月4日。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工业部编烟台酿酒操作法》,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6年。

17 方心芳《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最近的研究试验工作》。

节省酒曲用粮的方案¹⁸。北平解放后,方心芳很快进入了新政权的制酒团队。当时华北酒业专卖公司代行全国酒类产销管理职责,朱梅(1909-1991)是酒业公司中负责技术工作的总工程师¹⁹。朱梅早年与方心芳同在上海念大学,后又同时到比利时进修酿酒,两人关系密切。朱梅归国后先后在张裕葡萄酒厂、青岛啤酒厂掌舵,后进入轻工业部。他主攻的是啤酒和葡萄酒的改进技术,因此邀方心芳加入,参与白酒业务。1951年,在方心芳的指导下,麸曲先被应用在了酿造二锅头酒上²⁰。

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在成立之初,归财政部中央税务总局管理,实为产销一体。很快,1953年后,酒类行业开始归口管理,生产环节划入轻工业部和地方工业部,销售环节归商业系统²¹。轻工业系统接管白酒生产后,首要任务就是减少酒类产品的粮食消耗,提高出酒率。有了方心芳的技术经验,轻工部开始扩充技术团队。

周恒刚(1918-2004)是推动薯干酿酒和麸曲技术的另一位专家。1953年酒类生产归入轻工业部后,周恒刚从东北烟酒总公司调入轻工业部烟酒局任工程师,承担起节粮酿酒的任务。1953年,烟台酿酒厂曾利用瓜干酿制白酒成功,很快普及各县,并代替高粱酒²²。1954年3月30日,山东省工业厅驻烟台酿酒厂、威海酿酒厂工作组,提出《烟威酒厂提高出酒率的经验综合报告草案》,在山东省轻工系统内部的技术交流会上得到肯定²³。7月10日,山东《大众日报》发表了威海酒厂党支部

18 孙学悟、方心芳《改良高粱酒酿造之初步试验》,《黄海化学工业调查研究报告》,1934年第3期;方心芳等《麸皮发酵》,《黄海》,1948年第4期。

19 本刊编辑部《辛海庭谈新中国酒政始末上》,《中国酒》,2007年第7期。

20 《方心芳与中国酿酒科技》,傅金泉主编《中国酿酒微生物研究与应用》,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509页。

21 本刊编辑部《辛海庭谈新中国酒政始末上》,《中国酒》,2007年第7期。

22 烟台市一轻局编志室编《烟台市一轻工业志(1892-1985)》,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

23 烟台市一轻局编志室编《烟台市一轻工业志(1892-1985)》,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

委员会和副厂长等分别介绍的提高出酒率经验,指出其出酒率从 39% 提高至 48%²⁴。很快,烟台威海的经验得到中央层级的重视。1955 年 2 月 17 日至 26 日,山东省工业厅在烟台召开全省酿酒工业会议,邀请轻工业部专家参会,并总结推广烟台威海先进操作法的经验²⁵。周恒刚作为参会代表,决定带人在烟台酿酒厂试点 3 个月,写成《烟台酿酒操作法》一书,核心即以薯干代替高粱,以麸曲代替大曲。技术要点为:“低温发酵,定温蒸烧,黄曲加酒母”²⁶。该书开篇即称,这一操作法是“1956 年节约 125000 吨粮食的重要保证”²⁷。

1955 年 11 月,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和商业部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酿酒工业会议,为今后酿酒的技术目标定调: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提高出酒率为主;决定逐步利用薯类和果品等非粮食类新酒源代替粮食酿酒;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广烟台酒厂的先进经验,要求每百斤粮食多出 2 斤到 4 斤酒,实现 125,000 吨节粮目标²⁸。

但是,以非粮食类原料制酒却带来一个技术安全问题:薯类、果品除富含淀粉外,果胶含量也高,酿造过程中会分解大量甲醇。而甲醇对人体是剧毒化学物质,同时有蓄积作用,可导致失明甚至死亡。对此,轻工业部曾在南京组织“金陵试点”,试图降低甲醇浓度²⁹。事实上,1963 年的国家卫生标准对于薯干酒的甲醇含量标准本来就比粮食酒要宽松,允许薯干酒甲醇含量最大值是高粱酒的两倍(薯干酒甲醇含量 $<0.12\text{g}/100\text{ml}$,粮食酒甲醇含量 $<0.06/100\text{ml}$)。但即使如此,粮食酒在日

24 《学习威海酒厂的先进经验》,《大众日报》(第 2 版),1954 年 7 月 10 日。

25 烟台市一轻局编志室编《烟台市一轻工业志(1892-1985)》,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 年,第 117 页。

26 烟台市一轻局编志室编《烟台市一轻工业志(1892-1985)》,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1 年,第 117 页。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工业部编《烟台酿酒操作法》,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6 年,第 7 页。

28 李益三《提高出酒率,保证质量,节约粮食》,《人民日报》(第 2 版),1956 年 1 月 13 日。

29 本刊编辑部《辛海庭谈新中国酒政始末上》,《中国酒》,2007 年第 7 期。

常抽检时基本都能达标,薯干酒的合格率却只有 74%,不合格的产品最高超标四倍,几天之内累积饮用 3-5 斤酒即可引发中毒³⁰。由于大饥荒时期广泛使用薯干原料的代用品酒,几乎占到地方白酒总产量的一半³¹。许多地方酒厂即抱怨上述卫生标准过严,难以达到,可想而知在实际运作中甲醇超标难以避免³²。

除薯干及代用品外,以麸曲代替大曲,亦是烟台操作法带来的重要影响。由于麸曲用料便宜、对发酵环境要求低,出酒率高且速度快,成为受众最广泛的白酒产品。据统计,1980 年代之前,麸曲酒的产量占全国白酒总产量的 70%,这也包含了以麸曲发酵的薯干及代用品酒³³。

经过“烟台操作法”,白酒中最经典也是质量最好的高粱大曲酒,因消耗粮食较多,发酵周期长,对发酵环境要求严苛,出酒率低,被严格控制生产和消费,仅占全国白酒总产量的 1%³⁴。但正是这 1%,构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白酒产品的金字塔尖,亦是白酒评价体系得以建立的来源。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轻工业系统对于传统高粱白酒采取了选择性保护措施,这就包括与中共渊源深厚的茅台酒³⁵。1952 年 7 月,华北专卖公司在北京召开全国酒类专卖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地区干部携带样品酒,在会议后期评酒。当时的评选标准是:品质优良,符合高级酒类卫生标准;在国内获得好评,并为全国大部分消费者喜爱;历史悠久,已在全

30 《修订饮用酒卫生标准的依据》,甘肃省卫生防疫站编《食品卫生标准汇编》,1987 年,第 165-168 页;《蒸馏酒和配制酒的卫生标准》,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编《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科学技术成果汇编(1953-1992)》,1993 年,第 35 页。

31 即使是盛产优质粮食酒的贵州四川,各市县代用品酒的产量均占到一半以上。参见《贵州省志》、《习水县志》、《遵义地区志》、《黔西南州志》、《三台县志》等。

32 《蒸馏酒和配制酒的卫生标准》,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编《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科学技术成果汇编(1953-1992)》,1993 年,第 35 页。

33 秦含章《白酒酿造的科学与技术》,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7 年。

34 林洁,梁丽静主编《白酒生产工艺与流程》,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8 页。

35 《国务院拨款帮助八大名酒厂提高酒的质量》,《光明日报》(第 1 版),1956 年 6 月 20 日。

国市场销售;制造方法具有地方特点,不能仿造³⁶。会上选送了19种白酒,评选出4款名酒:茅台、泸州、汾酒、西凤。本次评酒会的牵头人,正是节粮酿酒的技术负责人朱梅,当时没有专业的评酒委员,而是经过初选,直接提交通过。

中共高层以周恩来为最高负责人,始终对高档白酒的生产关切有加。1953年地方工业部部长沙千里到国务院汇报工作,周恩来在汇报会上提出:“你们八大名酒的质量有所下降,应当注意。”沙部长说:“质量确有下降,主要原因是酒的贮藏期太短。”据报道,名酒质量下降,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单纯追求数量,原料的质量降低了。特别是没有科学根据地改变了过去的操作方法。直接了当的说,就是轻率地抛弃了祖先的经验,不了解这些操作方法是民族科学的遗产之一,减少发酵周期”³⁷。周恩来当即指示:“酒的贮藏期可以延长十年、八年也不要紧,你回去做一个计划来,可以投资³⁸。”资金在1956年得到落实,八大名酒的酒厂获得2,600万元的拨款,作为周转资金,开始把大批的酒窖藏起来³⁹。

1963年,轻工业部组织召开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从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196种各类酒中评选出18种全国名酒和27种优质酒⁴⁰。在此之前,各省、市分别组织了地方的评酒会,以供选送。在白酒品类中,第二届全国名酒的数量由4个增加到8个,增加了五粮液、古井贡酒、全兴大曲酒、董酒。新增加的名酒,都是从地方评酒会中参加选拔并脱颖而出的产品。此后,入选国家名酒就成为地方知名酒厂的最重要工作目标之一。

36 周恒刚《中国历届评酒回顾兼谈其作用》,《中国酒》1996年第1期。

37 《不仅仅是“名酒”制造者的教训》,《光明日报》(第3版),1956年8月21日。

38 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烟台文史资料第22辑》,第81-83页。

39 《国务院拨款帮助八大名酒厂提高酒的质量》,《光明日报》(第1版),1956年6月20日。

40 高月明《历届国家评酒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评选出的名酒、优质酒》,《酿酒》1987年第1期。

二,复制名酒:跨区域的技术流通

在全国数以千计的酒厂中,本文选择徐水酒厂作为田野调查的案例。最初设计时,笔者曾考虑徐水酒厂拥有全国五座最古老的窖池之一刘伶醉古烧锅(其他四个为:泸州老窖、水井街酒坊、剑南春天益老号、李渡烧锅,先后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实际上,全国范围内古烧锅遗址的发掘要晚的多,大多在1990年代以后。虽然徐水酒厂从民国时起就不间断地使用几口窖池酿酒,但这种延续性显然和发掘出的元代烧锅并无太大关联。换句话说,刘伶醉是一种新酒。而它的试制和毛泽东时代的技术流通密不可分。

在第一次评选出全国名酒之后,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开始了对名酒酿造技术的研究,分别在茅台、汾酒、泸州三个酒厂进行了试点,希望将名酒的技术工艺推广至更大范围。1959年4月至1960年3月,轻工业部的酿酒专家熊子书(1921-2019)带着一个七八人的团队,主持了贵州茅台酒的整理总结,希望搞清楚茅台酿造的技术规律。这项工作还得到了苏联化工专家的协助。团队提取出制曲、酿酒至成品勾兑等工序,发掘其传统工艺的特点,并编写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资料⁴¹。茅台多次蒸馏的“配方”在行业内迅速传播。1964年,轻工业部和贵州省再次成立科技试点组,抽调了辽宁、黑龙江、河北、天津、河南以及贵州省轻工研究所、贵州茅台酒厂科研人员,其中还包括已进入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方心芳和轻工部科学研究院发酵研究所所长秦含章(1908-2019),按照茅台酒的生产周期,分两期开展了科技试点研究。1965年,轻工业部在山西召开的茅台酒试点论证会,正式确定了茅台酒的三种典型体的确定及酱香型酒的命名。

此外,轻工业部不仅希望提高茅台酒厂的出酒率,将茅台的酿造技

41 熊子书《中国名优白酒酿造与研究》,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术流程化,甚至还希望规模化地复制茅台酒生产。为此,197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办公室下达了“茅台酒异地实验”项目计划,在离茅台150余公里的遵义市郊组建了“贵州茅台酒异地试验研究所”。整个实验完全采用茅台酒的原料、酒曲、窖泥,流程也完全依照茅台生产工艺,但最终生产的酒始终达不到茅台酒标准而失败。据主持异地实验的秦含章总结,“这是由茅台镇极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的,无法复制其形成微生物群的环境”⁴²。

与此同时,秦含章在1960年代初还主持了汾酒试点。汾酒试点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汾酒质量标准化的问题,因为过去汾酒生产“都是口授心传,酿造方法还处于经验状态,对于发酵过程的科学理论,又尚未明了,对工艺操作和产品质量难以正确的掌握与控制”。如果有经验的工人离开或者发生质量问题,将难以确保汾酒的质量稳定⁴³。秦含章在报告中提出汾酒的主体香型和汾酒的人工合成方法。即汾酒之所以具有清香的香味,最主要的主体香就是乙酸乙酯,而这种成分可以依靠人工合成实现⁴⁴。但与茅台酒一样,汾酒的发酵环境也十分独特,难以复制。因此,以茅台酒和汾酒为代表的酱香型和清香型白酒,并没有在全国大规模推广。

最成功的技术推广则是前后持续十年的泸州试点。1957-1958年,轻工部派技术人员到泸州大曲酒厂进行泸州老窖大曲酒的技术整理和总结,对泸州酒厂最古老的烧锅作坊温永胜烧锅的传统操作法进行访问、对证、回忆。之后,轻工部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本浓香型曲酒酿造方法的技术书《泸州老窖大曲酒》⁴⁵。

根据泸州酒厂的资料,1960-1980年代,酒厂把“人工培养老窖窖

42 杨丽凡《含章可贞:秦含章传》,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123页。

43 熊子书《中国名优白酒酿造与研究》,第108页。

44 杨丽凡《含章可贞:秦含章传》,第116页。

45 熊子书《中国名优白酒酿造与研究》,第53页。

泥”、“加速新窖老熟的技艺”、“成品酒勾兑调味技术理论”等广泛传播,相当于把传统操作法量化数据化,最后总结出综合酿酒操作法,“带动了全国浓香型白酒的大发展”⁴⁶。而人工制造老窖和新窖老熟的技术,是全国各新建酒厂扩建培育浓香白酒的关键所在⁴⁷。经过三次试点,轻工业部的技术团队发现,以泸州老窖为代表的浓香型白酒,在发酵环境上可复制,生产周期较茅台要短,乙酸乙酯的香气成分容易控制。同时,酒厂科技人员先后在成都、泸州等地举办了二十七期酿酒工艺和成品酒的勾兑训练班,为河南、河北、辽宁、吉林、湖北、贵州、江苏、上海等二十多个省市培养了近千名酿酒勾兑人员⁴⁸。由此,浓香型白酒在全国,尤其是酿酒工艺相对粗糙的北方地区迅速推广,成为各地方酒厂试制优质白酒的技术基础。

这种畅通无阻的技术流通,是毛时代计划体制的特殊优势。在全国的白酒生产纳入严格等级化,挤出1%的优质粮食酿造大曲酒后,对名酒技术的复制成为地方新产品遍地开花的条件。当然,并非所有的酒厂都能受到技术流通的眷顾,除非已具备很好的生产基础。徐水酒厂自建立之初就不是一张白纸。自明清至民国年间,高粱酒已成为徐水物产之一⁴⁹。道光年间,县城已有七家烧锅。民初,徐水县内“高粱制造烧酒,每年约产三万斤”⁵⁰。“干酒(即白酒)为徐水特品,零售批发多数运销外境”⁵¹。民国时期,徐水县成规模的造酒厂为“润泉涌烧锅”,业主为张树亭。1948年,中共占领徐水县城,润泉涌转为徐水县国营酒厂。在刘伶醉试制之前,徐水酒厂的“拳头产品”曾经是“徐水原酒”。据1960年代

46 政协四川省泸州市文史委编《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9年,第21-23页。

47 李大和《白酒勾兑技术问答》,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4页。

48 政协四川省泸州市文史委编《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9年,第21-23页。

49 《徐水县新志》卷三,第128页。

50 《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1917年,第311页。

51 《徐水县新志》卷三,第131页。

勾兑酒的工人回忆,徐水原酒基本上遵循了过去烧锅作坊的技术⁵²。但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白酒行业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技术流通,却促使徐水酒厂得以规模化生产质量稳定的新产品。1960年代初,因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短缺,中共曾一度限制酿酒。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亦得以整合各大小酒厂,并扶持特定的产品。1963年,徐水县人委发布《关于禁止私设酒厂的通知》,严禁公社、生产队酿酒,并将原料移交给县酒厂⁵³。同时,徐水县酒厂本身也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对基建和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⁵⁴。1971年,具有典型泸州浓香型风格的高粱酒“保定大曲”投产,成为一款供内销的高档酒。1972年负责刘伶醉技术攻关的是酒厂的张云亭班组,他是在保定大曲的工艺基础上试制的刘伶醉,曾经带人访问江苏洋河酒厂、山西汾酒厂、邯郸丛台酒厂以及四川的众多酒厂,“拜师学艺,引进技术”,成为刘伶醉试制的前提条件⁵⁵。

三,财贸下放与地方白酒的试制创牌

1973年12月,徐水酒厂张云亭班组试制成功新酒后,经厂里领导班子讨论,取名为“刘伶醉”。广交会后,保定地区外贸部门和徐水酒厂派人将酒和商标送到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审定。当时由于批林批孔,不知道刘伶属于儒家还是法家,不敢批准。酒厂和保定地区外贸部门商定后,定名为“徐水特曲”⁵⁶。

刘伶醉在试制之初就肩负着出口使命,而它之所以能成为河北省唯一出口白酒,“天津外贸曾给予大力的多方的援助”⁵⁷。天津外贸是全国

52 笔者对酒厂退休工人李某的访谈,2019年10月15日。

53 《关于禁止私设酒厂的通知》,1963年,保定市徐水区档案馆藏,档号:16-1-0324-0002。

54 《关于我县酒厂急需急需解决高扬程水泵和20千瓦高速发动机的请示》,1970年12月29日,保定市徐水区档案馆藏,档号:16-1-0456-0011。

55 《徐水酒厂张云亭班组的事迹》,1986年6月10日,保定市徐水区档案馆藏,档号:001-01-1026-0003。

56 《保定地区对外贸易志》,第67-68页。

出口口岸之一,但天津本身只有很少的原料货物,大部分都是从河北、北京、内蒙、山西等地调入,而以河北最多⁵⁸。文革之前,天津作为河北下辖市,保定作为河北省省会,双方业务关系密切。徐水酒厂的领导班子中,负责业务的两位副厂长皆出身于天津轻工学院⁵⁹。天津轻工学院是毛泽东时代全国四大部属轻工业院校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无锡、北京、沈阳轻工业学院。据酒厂工人回忆,1970年代徐水酒厂的领导班子包括李景和、杜仲祥、刘文芳等人,同时河北保定地区外贸局的何建业作为驻酒厂干部,长期与酒厂发生业务联系。而李景和、何建业在天津外贸有大量的人脉资源,刘伶醉酒的出口,就是他们和天津口岸谈下来的⁶⁰。

在刘伶醉试制和创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保定地区外贸和徐水酒厂的深度参与。以往,在产品供给方面,酒厂作为原料提供方,只有完成收购、加工任务的义务,地区外贸则是单纯传达上级命令。在商标品牌上,由于长期实行统购包销,企业并不重视商标,甚至不使用商标⁶¹。那地方的积极性来自哪里?

中共九大之后,出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实行经济体制的下放。1970年7月,财政部在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下放财政、信贷管理权限,将企业上缴财政的折旧基金全部下放给地方⁶²。当年,国务院把79个部门裁并为32个部门,其中10个部门属于军队系统,中央职能大大减少。1971年3月1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的通知》,规定自1971年起,国家对省、市、自治区实行“定收定支、收支

57 《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关于徐水酒厂代天津外贸加工白酒情况的报告》,1975年6月12日,保定市档案馆藏,档号036-01-0005。

58 张坤《新中国天津商贸业60年(1949-201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3-164页。

59 笔者对酒厂退休工人李某的访谈,2019年10月15日。

60 笔者对酒厂退休工人李某的访谈,2019年10月15日。

61 苏雪丹、翟达清《商标广告管理实用手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62 辛向阳《百年博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100》,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大包干”办法。将除中央直属的基建和物资以及国防、外援项目外,财政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有的省级财政实行这一方法后,又把包干指标层层包到地区、市、县。财政下放后,中央直接掌握的财力只有 14.5% 左右,超收的全部归地方支配,短收的则要中央补贴⁶³。

学界对于这次下放的评价普遍不高⁶⁴。认为下放使各地方经济自成体系,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⁶⁵。同时包干制只按历史基数核定财政收支,漠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变化,且截留比例随机性甚大,透明度极弱,因此,导致地方与中央关系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过程之中。然而,下放带来的直接结果,的确导致地方投资积极性的扩大,企业成为地方攫取财政收入的关键。

同时,外贸系统也在 1970 年开始下放,外贸部在各地的企业全部下放地方,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⁶⁶。而且对于下放的过程,中央还不断催促,要求“成熟一个地方就下放一个地方,成熟一个企业就下放一个企业。今年应把下放企业基本下放完”⁶⁷。1970 年 4 月,周恩来春季广交会上提出“外贸要促内贸,促生产。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很快,外贸系统恢复了“以进养出”业务,即以进口原料、设备以出口成品加工品,实现创汇利润最大化⁶⁸。主持外贸工作的李先念也提出,由于援外任务增加,国内需要安排必需品,1971 年后要“增加出口任务”⁶⁹。1974 年,又开辟包括河北在内的几个内陆省份为

63 辛向阳《百年博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100》,第 270 页。

64 参见林超超《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 年;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年。

65 韩岫岚主编《中国企业史》,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年,第 627 页。

66 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 104 页。

67 《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68 页

68 孙玉琴《中国对外开放史第三卷》,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03 页。

贸易口岸,且除西藏外各省可以直接向港澳发运出口物资⁷⁰。

财贸权力下放和出口任务的刺激,让徐水酒厂开始在业务上扩张。首先,徐水特曲酒的制成,共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厂方开支各种费用共一万一千元,最终由省外贸厅拨付⁷¹。开始出口后,1976年4月23日,徐水酒厂申请扩建厂房贷款5万元得到批准⁷²。1977年,酒厂要求扩建特曲酒投资车间⁷³。同时从1974到1980年,几乎每年轻工、外贸、商业三个部门都会解决徐水酒厂酿酒用粮的需要,在计划外单独拨发粮食⁷⁴。

不仅仅是徐水酒厂,财贸权力下放和出口任务的刺激,让众多基层酒厂开始在业务上扩张。河南商丘的张弓酒厂,1971年和1974年分别获得宁陵县委两次投资共50万元扩建厂房,提高生产能力,并且在1974年承接了轻工部发酵研究所试制38度低度白酒的任务⁷⁵。传统白酒一般都是50-65度甚至更高,出口到国外需要课烈酒税,因此,低度酒开发也成为创汇的新任务。38度张弓酒于1976年经国家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批准出口,主要销售至港澳、东南亚地区,成为当时出口量最多的白酒之一。而在技术流通的体制下,低度白酒的生产技术很快被张

69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年谱第五卷》,第101页。

70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71 《对徐水特曲酒的生产和管理意见的报告》,1974年12月31日,保定市档案馆藏,档号:0036-02-0100。

72 《关于徐水酒厂使用出口工业品生产专项贷款的通知》,1976年4月23日,保定市档案馆藏,档号:036-01-072-39。

73 《徐水县革命委员会工业局关于扩建特曲制酒车间投资的请示》,1977年,保定市徐水区档案馆藏,档号:16-1-0592-0032。

74 《徐水县酒厂革命委员会关于请示迅速解决我厂制酒麸料和红粮问题的报告》,1977年7月6日,徐水区档案馆藏,档号:16-1-0592-0033;《关于下达一九七八年上半年酿酒用粮指标的通知》,1978年4月5日,保定市档案馆藏,档号:0038-01-0387-010。

75 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经济卷 卷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2页

弓酒厂公开发表在《酿酒》杂志,并复制到国内 130 多家酒厂⁷⁶。与刘伶醉齐名的杜康酒,在 1972 年由河南伊川县酒厂试制成功。伊川酒厂是 1968 年底县政府投资组建的新厂,当年投资 8 万元,设计生产能力 300 吨,包括粮食酒、薯干酒。1971 年,在财贸权下放后,县政府追加了 47 万元投资,新增建筑面积 3007 平方米。在 1973 年到 1974 年,酒厂又获得河南省投资 63 万元,兴建了杜康酒酿造车间,面积达 2961 平方米⁷⁷。1971 年 7 月,伊川酒厂技术组参观安徽亳州古井贡酒厂后,成立“恢复杜康酒调研组”,计划打造出新的杜康酒⁷⁸。而杜康酒的古老技术早已失传,新杜康酒主要是泸州老窖推广的浓香型和人工窖池老熟技术⁷⁹。杜康酒试制成功后,1975 年即开始出口,到 1979 年已大批出口至国外⁸⁰。与刘伶醉、张弓、杜康类似的故事也在 1970 年代扎堆发生(如表 1)。

表 1 1970 年代试制成功的地方名优白酒

品名	试制时间	酒厂名	称号
凤城老窖 ⁸¹	1970	辽宁凤城县食品酿造厂	“辽宁小茅台” ⁸²
宋河粮液 ⁸³	1970	河南鹿邑县酒厂	“河南小茅台” ⁸⁴
古贝春 ⁸⁵	1972	山东武城县酒厂	“北方小茅台” ⁸⁶
曲阜特曲 ⁸⁷	1974	山东曲阜酒厂	“山东小茅台” ⁸⁸
燕潮酩 ⁸⁹	1975	河北三河县燕郊酒厂	无
湘泉酒 ⁹⁰	1976	湖南吉首酿酒厂	“湖南小茅台”、 “湘酒王” ⁹¹
迎春酒 ⁹²	1976	河北廊坊安次县酒厂	“北方小茅台” ⁹³

76 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经济卷 卷一》,第 293 页。

77 李耀曾主编《中国杜康酒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5 页

78 李耀曾主编《中国杜康酒志》,第 3 页。

有关刘伶醉的名称争议尚未解决。刘伶到底是儒家还是法家的结论一直悬在上面,而“徐水特曲”的名称外国客人又不认⁹⁴。保定地区外贸局开始发挥能动性,他们和酒厂一起联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历史博物馆的专家,搜集刘伶的资料,认为刘伶是晋代竹林七贤之一,喝酒是因为当时对社会不满,蔑视旧礼教,属于法家,不属于儒家。1976年,保定地区外贸局将专家材料报至主管白酒出口的最高管理部门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至1978年终获批准,恢复了刘伶醉的名称⁹⁵。

但如果想大规模出口,只在广交会露脸尚不足以获得行业内资源。保定地区在1978年开始筹划次年第三届评酒会上选送刘伶醉评比全国名优酒。在刘伶醉刚刚试制成功时,虽然获得外商赞扬为“小茅台”,但同时也指出其缺点是“酒新欠柔和”⁹⁶。1979年4月,河北省先组织了一场省级评酒会,刘伶醉与邯郸丛台酒、衡水老白干一起被评为河北省名

79 李耀曾主编《中国杜康酒志》,第11页。

80 李耀曾主编《中国杜康酒志》,第52页。

81 万兴主编《凤城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718页。

82 《纵横 - 中国商品指南辽宁分册 1993》,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83 何翰宗等《河南特产风味指南》,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155页。

84 河南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编《河南省横向经济联系手册》,1987年,第284页。

85 顾金栋《古贝春香飘四海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

86 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 1987》,1988年,第340页。

87 政协山东省曲阜市文史委《曲阜文史第14辑:曲阜工商经济史料专辑》,1994年,第73页。

88 赵连仲主编《曲阜一轻工业志》,1987年,第85页。

89 政协三河市文史委编《三河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2000年,第144页。

90 《湘泉酒》,政协吉首市文史委《吉首文史第1辑》,1991年,第152页。

91 政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史委编《湘西文史资料第27辑》,1992年,第10页。

92 中国工商银行廊坊分行编《廊坊工业六十家》,1994年,第77页。

93 廊坊地区地名办公室编《廊坊地区地名志》,1983年,第197页。

94 保定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局编《保定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志》,北京: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67-68页。

95 保定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局编《保定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志》,第67-68页。

96 《河北省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对徐水特曲酒的生产和管理意见的报告》,1974年12月31日,保定市档案馆藏,档号:036-02-0010。

酒,但刘伶醉的分数不如丛台,样品酒的味道不够理想,还有漂浮物,与之孪生的保定大曲甚至落选。外贸局通知徐水酒厂,“这是一个上去上不去的重要关键。希望徐水的特曲和大曲要争这个荣誉”⁹⁷。但最终,在1979年底第三届评酒会上,也就是在白酒等级化标准完全确立、技术流通已辐射全国各地、地方品牌大规模崛起后的首次评酒条件下,刘伶醉并未入选全国名优酒行列。这很可能和它长期出口产能不足及初期质量工艺不稳定有关。有资料显示,1979年刘伶醉酒的发酵期就从120天缩至30天,而这类试验很可能在1979年之前就已经展开⁹⁸。

结 语

1970年代地方名酒的制造,给我们提供了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下的某种新机制:地方产品在计划体制下复制了全国名品的评价体系和选拔机制。中央为知名产品集中资金、打通全国产销网络,一定程度上给予地方创造名品的积极性。此外,由国家主导的技术协作,使地方产品的跨区域、规模化复制成为可能。一旦遭遇权力下放和自主性的缺口,地方就会利用既有资源,在出口层面更加积极地尝试计划体制规则之外的方法,从而以理性的经营逻辑实现收入最大化。虽然中共领导人有一句百谈不厌的话,叫“一放就乱,一抓就死”,但在创汇驱动面前,再小的核算单位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似的路径。地方名酒“小茅台”的集中涌现,正是这一机制的体现。

另一方面,“小茅台”诞生的基础又离不开计划时代对技术壁垒的破除。官方以行政手段介入名酒的制造,并通过“评酒”的方式将其标准化。我们亦可以观察中央与地方在处理同一事物过程中的目标一致性

97 《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为明年制酿更好的酒、满足人民需要的酒》,1978年11月,保定市档案馆藏,档号:107-01-0006-41。

98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科技情报效果编辑组编《科技情报效果400例》,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与不同点。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后有何异同,那么相同点是,直到 1980 年代,名酒的供应,仍然包含着出口创汇的驱动因素⁹⁹。而不同点是,这一时期企业的自主权更加扩大,例如徐水县酒厂专门为以广东、福建人为主的东南亚及北美华侨客户研制了“九九还童酒”、“三鞭酒”等药酒¹⁰⁰。经过文革后期外贸策略洗礼的酒厂,地方企业已经充分学会招揽他们的客人了。



图 1 徐水刘伶醉酒厂的制酒(作者拍摄)

99 《商业部、轻工业部关于对大饭店增加名酒供应争取多创外汇的通知》,1985 年 9 月 23 日,商业部办公厅编《1985 年商业政策法规汇编》,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 年,第 188 页。

100 保定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局编《保定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志》,第 68 页。



图2 徐水刘伶醉酒厂的制酒(作者拍摄)

『小茅台』

——1970年代中国における地酒ブランド化と貿易戦略

要旨：白酒（蒸留酒）は、国家専売の工業製品であるのみならず、毛沢東時代にブランド化が進んだ消費財でもある。1949年以降、中国共産党は「食糧用穀物を節約して酒を醸造する」という方針を計画的に推進し、高品質の原料を集めて少数の高級名酒の生産を保障した。財政貿易部門は、白酒のブランドと等級システムを確立するために、しばしば全国的な品評会を開催した。そうした展開はローカルな白酒のブランド化を促し、1970年代初期には県級の国营酒造工場が相次いで新たな名酒を試作した。試作に成功した酒は、従来の命名のルールを変え、新ブランドとして酒類品評会や輸出市場に進出し、「小茅台」と称される地方のブランドが数多く誕生した。この現象の背後には、複数の原因が存在

する。1つは、「名酒醸造試行事業」に代表される地域横断的な技術の流通によって、地方独自の酒造技術が全国に普及し、各地で新酒を試作する条件が整ったことであった。もう1つは、財政・貿易の権限が1970年に下級機関に移譲されたことによって、県級の酒造工場が多額のインフラ投資を得ると同時に、輸出によって外貨を獲得するという地方の要求が高まったことであった。中国の地方の名酒がブランド化したことは、毛沢東時代末期の中国共産党の特殊な市場経済経験をあらわすものである。

“The Small Moutai”: The Br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Foreign Trade Strategy of the Local Chinese Liquor in the 1970s

Abstract: Chinese liquor is not only a state-controlled industrial good, but also a branded consumer product. After 1949,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saving grain to make liquor in a planned manner, and focused on high-quality raw materials to ensure the production of a few high-grade famous types of liquor. The Finance and Trade Department organized several national liquor shows to establish the liquor brands and grade system. These basic actions stimulated the branding of local liquor. In the early 1970s, county-level state-owned distilleries tried to produce new famous liquors one after another and changed the naming rules, entering the liquor evaluation system and export market as new brands. A large number of local famous liquor brands known as “Small Maotai” were born. There are some reasons behind this phenomenon. On the one hand, the cross-regional technology circul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pilot famous liquor transferred the liquor making technology from local areas to the entire country,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trial production of new liquor.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financial and foreign trade powers in 1970, county-level distilleries were available for large amounts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demand for earning foreign exchange through exports increased. The branding of the famous local Chinese liquor revealed the special market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late Mao Zedong era.